

看世界

# 美国“税来税又去”的闹剧

□ 赵 晓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意见作出判决：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一揽子全球关税缺乏法律依据，“自始无效”。然而，判决墨迹未干，白宫旋即宣布，将援引另一法案继续加征关税。这一幕“司法否决、行政再征”的戏码，绝非简单的法律程序之争，而是将美国政治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与霸权逻辑的自我反噬暴露在世界面前。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力衰退期，如何陷入一种“税来税又去”的路径依赖与战略焦虑。

要理解这场闹剧的深意，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的纵深感中审视。

作为自美国建国以来便深植于其政治基因中的工具，关税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政策，成为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与转嫁国内矛盾的阀门。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发生在近一个世纪之前。那场以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为标志的贸易保护狂潮，非但未能挽救大萧条中的美国经济，反而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爆全球报复性关税战，导致国际贸易急剧萎缩，并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经济层面的伏笔。

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当一个大国试图以高墙隔绝世界来保全自身时，往往最先窒息的是自己。

本届美国政府将关税武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化、工具化与随意化境地。

其政策

早已脱离了传统贸易纠偏的范畴，演变成为一种服务于多重复杂目的的“复合型霸权工具”。

——它是“政治提款机”，旨在迎合国内特定的民情情绪，将复杂的产业空心化、收入不平等问题简单归结于“外国不公平贸易”，为“美国优先”的口号注入看似强硬的注脚，服务于选举政治与国内动员。

——它还是“财政补血袋”，在财政窟窿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向全球征税来弥补收入，维系其国内议程的运转。

——它更是“外交胁迫棒”，关税税率与谈判让步直接挂钩，成为其向盟友索取更高军费分摊、向发展中国家强加政治条件、在各类议题上极限施压的万能筹码。

这一系列操作，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祸患。它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预期，迫使企业陷入“生产向何处去”的长期迷茫，抑制了投资与创新活力。同时，它还推高了全球通胀压力，特别是让那些依赖国际贸易的发展中经济体承受了不成比例的代价，侵蚀了多年来全球减贫的努力。更致命的是，它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破坏，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丛林法则，替代了历经数十年艰难构建起的虽不完善却至关重要的国际规则网络。美国此举，无异于亲手拆解了支撑战后全球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基础架构，将世界推向更加分裂乃至对抗的风险之中。

这场看似对外挥舞的大棒，也如一枚巨大的回旋镖，

势大力沉地回击在了美国自己身上。

首先，它暴露了“行政权扩张与宪法制衡”的激烈冲突。特朗普政府滥用“国际紧急状态”这一概念，将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等常态化问题包装成国家安全危机，试图绕过国会，攫取近乎无限的征税权。这直接触动了征税权属于国会的原有原则，凸显了美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其次，它揭示了“国内政治极化与治理失灵”的恶性循环。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并未获得一致支持，反而激化了社会分裂。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部分企业、依赖进口消费品的普通家庭以及遭受贸易伙伴报复的农业州，早已苦不堪言。国会内部以及共和党和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两党之间，围绕关税的合法性与经济代价争吵不休。然而，在极化政治下，理性的政策辩论让位于党派立场与选举算计，本应基于专业评估的行政决策，高度依赖总统个人的意志与社交媒体上的情绪波动。这种治理失灵，使得一项明显弊大于利且被司法裁定存在合法性缺陷的政策，仍能凭借行政执念继续推进。

再次，它反映了霸权焦虑与战略短视的深度捆绑。有的政客对关税的痴迷，部分源于一种对历史的选择性回溯与误读。比如，推崇19世纪末的“关税之王”麦金莱，幻想通过高关税壁垒重现美国制造业独霸全球的旧梦。这种论调忽视了当今全球经济你中有我、深度互联的根本性变化，也回避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等内在结构性难题。试图通过对外筑墙来解决内部积弊，无异于缘木求鱼。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正在加速消耗美国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信誉与盟友体系。当关税大棒无差别地挥向盟友与对手，当国际承诺因政府更迭或总统在社交媒体的帖子而朝令夕改，美国的政策可信度与领导力便急剧流失。此举不仅未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促使欧盟、东亚乃至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推进战略自主，寻求减少对美元体系和美国市场的依赖，为“去美国中心化”的多极世界秩序埋下伏笔。

最高法院的判决与白宫的即刻反弹，构成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闭环。它说明，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任何基于制度与理性的纠偏努力，都可能被短期的政治利益与个人的权力意志所抵消。关税，已从一个经济工具，异化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社会分裂和战略迷茫的集中体现。

美国“税来税又去”的闹剧，表面上展现了行政权力的强势，实质上暴露的是体制的僵化、共识的破裂与方向的迷失。它未能带来其许诺的繁荣，反而加剧了国内的通胀压力与生活成本危机，将普通家庭置于全球贸易战的前线。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常押着相似的韵脚。当前美国的关税狂热，与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回声重叠，警示孤立与对抗可能带来的全球性风险。对于世界而言，美国带来的这场内耗及其外溢效应，意味着必须为更大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也再次印证了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体系、聚焦自身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主战略定力重要性。



# 英国制药业站

英国制药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脱欧”后的监管磨合、英国国民保健制度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困境等，也构成了掣肘英国制药业创新的内部系统压力。

以葛兰素史克为例，该公司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挖掘基因数据，但如何将海量的数据转化为可成药的靶点却是痛点所在。葛兰素史克首席科学官托尼·伍德表示，未来的竞争在于“功能基因组学”与机器学习的结合。由于患者隐私保护和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数据系统的碎片化，药企在获取高质量数据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面临巨大阻碍。

此外，英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但英国在生命科学落地环节却面临严峻的结构性阻碍，被业界形容为“科学强、商业弱”。

英国制药巨头默沙东公司2025年9月宣布将关停其在伦敦的两家实验室，并撤销一项在英国的大型投资计划。该公司称，英国在生命科学投资方面缺乏进展，且“历届英国政府都低估了创新药物和疫苗的价值”。

多名初创企业负责人在剑桥生物医学园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缺乏敢于冒险的专业生物医药投资者群体，导致许多企业在成长关键期面临资金链断裂。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下的相关政策也制约了创新药的准入。受财政压力和成本控制等因素影响，该医疗体系新药支付价格偏低，且准入门槛较高，临床试验招募志愿者的过程也耗时较长。这些都限制了在英国成功推出一款新药的效率与商业回报，削弱了企业在英国开展临床试验和重大研发项目的动力。

此外，“脱欧”增加了英国的药品进出口文书工作等非关税壁垒，导致供应链响应速度变慢。欧洲科学家的自由流动受限也为英国实验室招募欧盟顶尖人才增加了阻力。

(据新华社电)

随着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合成生物学等前沿科技快速发展，全球生物医药领域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以阿斯利康与葛兰素史克两家制药巨头为重要支柱、以牛津剑桥伦敦为核心的英国制药业，正站在决定未来走向的“十字路口”：是引领新一轮产业浪潮，还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滑向边缘？

## 底气

英国制药业发展有着独特优势，其“护城河”建立在深厚的科学积累与日趋完善的数据生态之上。

英国的全球基因组学研究起步较早，这一历史优势正在转化为数据时代的红利。据英国《自然》杂志分析，英国生物样本库是目前全球制药巨头眼中最珍贵的资产之一。这一样本库拥有50万志愿者基因的详细基因和健康数据，且追踪时间跨度长、数据质量高。这使得英国成为利用大数据寻找药物靶点的全球要地。

此外，英国高校与药企之间存在着成熟的转化机制。剑桥生物医学园区不仅容纳了阿斯利康总部，还聚集了大量从大学实验室剥离出来的初创公司。这种物理空间上的零距离，极大地降低了技术转让的“摩擦成本”。

作为全球第一个批准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监管机构，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监管局的敏捷性受到称赞。该机构2025年宣布，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已使英国临床试验审批速度提高1倍。

## 挑战

新兴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例如，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能够极大地加速药物研发进程。数十年前，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以及设计全新蛋白质为人类所用，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人工智能模型“阿尔法折叠2”助力下，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人们正用其对抗生素耐药性、寻找疟疾等疾病的新疗法。

尽管英国有着深厚的科学底蕴，但整

# 脑洞

□ 肖 瀚

# 把自己“产品化”？

当一名投资人将自己视作投资对象，并以对待被投企业的态度审视、规划自身成长路径时，或许，他已经变成一位思想家了。

纳瓦尔·拉维坎特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

作为硅谷最有名的投资人之一，纳瓦尔曾提出过一个非常出名的理论——“把自己产品化”。他认为，要实现人生价值只需要抓住两个关键词，分别为代表独特性的“自己”以及代表功能性的“产品”。相较于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能为社会提供哪些有需求但无供给的东西”。

2020年，美国作家埃里克·乔根森收集和整理了纳瓦尔发表于社交媒体上的文章，汇编成一本名叫《纳瓦尔宝典》的书籍出版。这本畅销书详细阐述了“把自己产品化”的方法。

先来看“找自己”。在纳瓦尔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其特征是“对别人来说是工作，对你来说更像玩”。他建议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比如，有些人虽然考试成绩一般，但沟通能力特别强，从老师到同学再到隔壁邻居无人不熟；有些人尤其擅长个别学科，别人抓耳挠腮也搞不明白的题目，他理解起来似乎没什么难度；还有人运动能力很强，只要到了操场上就像“鱼儿回到水中”。在纳瓦尔看来，“死磕”自己的短板固然是一种不错的成

长路径，但发挥自己的专长更具想象空间，毕竟，“在‘成为自己’这件事情上，没人能比得过你”。

再来看“产品化”。纳瓦尔认为，任何事物要变成产品，都需要杠杆，人也一样，唯有结合杠杆，个人能力才有可能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生价值”。比如，一位技艺精湛的医生如果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需要供职于一家医院，此时，雇佣关系就是杠杆(劳动力杠杆)；一位科研人员如果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造福社会，必须完成产学研转化，此时，项目投资方就是杠杆(金融杠杆)。不过，作为一名偏爱科技企业的投资人，他对于这两种杠杆都没什么偏好，认为这些都是“过时的玩意儿”，真正值得期待的杠杆是代码。“代码的强大之处在于不需要外力，并且可以‘无限复制’”，也即“边际成本为零”，其中一个佐证是近些年成长速度最快、股票表现最好的企业大多数都是科技型企业。

理解了代码对于“把自己产品化”的意义，就不难理解纳瓦尔在前段时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带宽理论”了。

在这场访谈中，纳瓦尔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内耗”问题坦言，40岁是一个门槛。“年轻时，我以为情绪是奋斗的燃料，但过了40岁才发现，人生最贵的资产是‘带宽’……如果你把这宝贵的‘带宽’，用来在深夜‘反

刍’一个人的冷眼，用来纠结一个无法改变的决定，那么，你正在进行一场人生中最亏本的投资。”

“很多人分不清‘自己’和‘自己的念头’。”在访谈中，纳瓦尔反复强调，一些人明知道内耗没有用，但却停不下来，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以为“那些翻江倒海的情绪就是自己”。但其实，情绪只是大脑里的一串代码，如果作为主程序的自己不去主动终止这些代码的运行，大脑就会一直处于“后台耗电”状态。

他建议大家尝试将自己抽离出来，像旁观者一样观察自己的念头：“哦，那个关于‘自卑’的垃圾代码又在占用内存了。”“那个关于‘后悔’的流氓软件又自动运行了。”看清它，卸载它，给自己打上密密匝匝的“系统补丁”，既是拒绝内耗的开始，也是启动人生加速器的“油门”。

在访谈的最后，主持人请纳瓦尔给年轻人提一些建议。纳瓦尔思量了几秒，给出了两个极具争议的单词：“Expect Nothing(不抱任何期待)”这其实是英文中的一句俗语，说全了应该是“Expect Nothing, Take Jumps(不要期待，直接行动)”。不要再为了一时的得失而内耗，全然地投入“把自己产品化”的进程中，这样的“系统设置”或许才是纳瓦尔能够从从一个出身底层家庭的穷小子逆袭风翻盘为硅谷大伽真正的“宝典”。

